

六 明清时期的邮驿

1 “龙场九驿”

朱元璋在 1368 年建立了明朝，在他称帝的第 22 天就下令整顿和恢复全国的驿站。第二年，他又颁诏，把元朝的“站”一律改称为“驿”，还有全国 230 多处不雅的驿名改得更为雅致。与此同时，朱元璋还大力从事边疆地区的邮驿设施的建设。

在明朝边疆邮驿的发展中，有一个历史上十分有名的奢香夫人的故事。奢香是一位深明大义的贵州彝族的女首领，她的事迹现在已在我国电视屏幕上与群众见面。明太祖朱元璋时候，贵州土司霁翠接受明朝的领导。10 年后霁翠去世，他的妻子奢香继续掌管彝族部落。明政府派去的都督马烨专横跋扈，有意侮辱奢香，还肆意凌辱和压迫彝族人民。奢香的部下义愤填膺，都劝她起兵反抗。奢香却忍辱负重，让她的知心朋友另一个彝族首领刘氏夫人奔赴京师，向朱元璋报告了马烨的罪行。朱元璋把奢香召进京师，对她说：我可以给你们除掉作威作福的马烨，但你们打算怎样报答朝廷呢？奢香回答说：愿率领子女，世世代代不叛明朝。朱元璋说：这是当然的义务，不能算做报答。还有什么打算呢？奢香又回答说：从贵州往东北有一条小路可通四川，现已梗塞不通，我愿出钱出人，开山辟岭，修成驿道，以此来报答皇上的恩典。朱元璋对此大为赞赏，立即把马烨捉拿至京，依罪处斩。奢香回贵州后立即组织人力，开始修路。一共修了 560 多里山路，建立了九驿。因为第一站在贵阳西北万山丛中的龙场，因此总称为“龙场九驿”。从此，从明政府的腹地，可以由宽敞的驿道直达云贵边疆，沟通了中原和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。这是我国民族团结史上的一段佳话，也是我国邮驿发展史上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，明朝人吴国纶有《奢香驿诗》专门歌颂奢香夫人说：“我闻水西奢香氏，奉诏曾谒高皇宫。承恩一诺九驿通，凿山穿木开蒙茸，至今承平二百载，牂牁[zāng kē 脏苛]夔[bó 勃]道犹同风。”蒙茸是从山峻岭的意思，牂牁、夔道都是云贵地区的地名，说明这些地区经济文化也赶上了中原，民风相同了。

除西南云贵地区外，朱元璋在我国东北、北部和西北边疆地区，都开辟了驿道，设置了驿站，使中央和边疆地区的联系大大加强。明初在东起鸭绿江，西至嘉峪关先后设置了 9 个军事重镇，号称“九边”。沿边 8000 多里地方，都设置了驿所，互通信息。朱元璋的儿子朱棣（明成祖）时候，又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，设置了奴尔干都司，建立了 45 处驿站，有效地管理了这一地区的行政事务。

明朝为了加强对东北边疆的统治，在辽东地区广设驿站。以辽阳为中心，辐射有四条驿道干线：一条南行至旅顺口，途设十二个站；一条西南行到山海关，

途有十七个驿站；一条北往开原，计五站；另一条东南行抵九连城，共七站。在各驿站俱设驿兵、轿夫、船车、马驴等。在辽东都司管辖下，明政府还设有“夷人馆”、“朝鲜馆”，专管少数民族驿务。值得指出的是，明成祖永乐年间，派太监亦失哈在奴尔干地区设立了水陆联运驿路。明初，东北黑龙江流域海西女真、建州女真、野人女真酋长“悉境来附”，明政府皆给予印信，在那里建立了奴尔干、建州等九卫。为经营奴尔干地区，明政府在该地区除设立驿站外，又在吉林开设船厂，辟有水运驿道。从辽阳出发，溯辽河而上至开原，经陆驿达松花江，再由松花江乘水驿船至奴尔干。这条水陆联运驿路共设官兵 3000 人，每年供军粮两万多石，途经虎皮驿、沈阳驿、银州驿、开原驿等，是一条明政府联络东北广大地区的通道。

明朝在西藏地区加强了驿道建设。西藏在元朝时仍称吐蕃，元政府早在那里设置了驿站，据《经世大典》记载，元时藏区共设大驿站 28 处，小站也约七八处。那时西藏地区的宗教领袖和地方官员经常持玺书、驿券和官员文牒在驿道上来往，有时“遣使驰驿不下百余匹”（《永乐大典》卷一九四二〇）。明朝时西藏称乌斯藏。为加强汉藏地区的联系，明政府多次下令恢复和修建西藏通内地的驿路和驿站。成祖永乐五年（公元 1407 年），明政府曾命令藏区的阐化王、护教王、赞普王和国师率川藏诸族合力恢复驿站，开辟了雅州乌斯藏的驿路。这是一条继甘藏驿路后又一条从内地到乌斯藏的新驿路。这条驿路交通方便，沿途衣食供给十分丰厚，既保证了明政府对乌斯藏地区诏书、旨令、文书的畅达，也便利了西藏对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。

明朝在东南海疆也设立了对外经济往来的驿所。明成祖永乐年间（公元 1403—1424 年），在广东设怀远驿，福建设来远驿，浙江设安远驿，专门负责接待外国使臣和商人。

2 “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”

朱元璋鉴于元朝驿站混乱的教训，一开始就用严法对某些特权者进行了限制。他明白规定：“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”（《昭代王章》），意即不是国家与军事大事，一律不许滥用驿马或动用驿站的邮递设施。在朱元璋做皇帝的第 26 年，亦即 1393 年，颁布了《应合给驿条例》，规定加上附加条件共 12 条，限定了符合用驿马驿船条件的人员，其他人一律不得“擅自乘驿传船马”，违者重罚。

但尽管朱元璋如此严格地规定，却仍有人明知故犯。这些人一般都自以为有坚实的靠山，不把政府的法规放在眼里。有的人无理鞭打驿夫，也有人不持驿牌强行驰驿，多索车马。有一个曾经是开国功臣封为吉安侯爵的陆仲亨，从陕西返京，就不顾王法，擅乘驿传。朱元璋为此龙颜大怒，斥责陆仲亨说：中原历经战患，人民刚刚过上安定生活，驿户好不容易买上马，生活还十分艰苦。都像你这样所作所为，百姓即使卖儿卖女，也不能满足奢望的啊！陆仲亨因此不再被重用，后来他因谋叛罪被杀。

朱元璋还因违犯驿规罪重罚了两个女婿。一个是驸马郭镇。他从辽东出差回来，违章私带了三杠榛子，沿途擅用驿夫运送。朱元璋得知此事，立命郭镇如数补上私用驿夫的报酬银两，并同时敕命在山海关沿线各关驿站，张贴榜文，规定以后再不许可有利用官驿私带货物的现象发生，不然一律治罪。另一个是驸马都尉欧阳伦，他多次违禁利用驿递走私茶叶，其家奴尤为横暴，强迫驿站车辆为其运货，还随意谩骂殴打执法人员。朱元璋知道了这件事，十分震怒，把欧阳伦赐死，他的家奴一并处以死刑。

这几件事对整治驿站，起了很大作用。从此，明朝邮驿井井有条。“驿递清乐，而里甲不扰”（顾祖禹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卷六十一）。邮驿发展了，国家财政年年有余。

3 “会同馆”和“递运所”制度

明朝的法律大典《明会典》记载说：“自京师达于四方设有驿传，在京曰会同馆，在外曰水马驿并递运所。”这条记载说明，明朝的“会同馆”，是当时设在首都北京的全国驿站的总枢纽。

会同馆有两种职能，一是起邮驿传递书信的作用；另一还同时起着国家级的高级招待所的作用，这里可以供外国使节和王府公差及高级官员食宿。有时还由政府在这里举行国宴，招待来自邻国日本、朝鲜、越南等国的进贡人员。

会同馆的马和马夫都有定额，一般设馆夫400名，马171匹，驴173头。有时人员不够用，则临时又从民间抽调服务人员。比如，在明正统帝时，西藏来了344位进京的僧俗人员。北京会同馆人手不够，便又从外面雇用了一些市民。

明朝地方馆驿，有些负责接待中外客人。有一篇《改建芜湖县馆驿记》记载说：芜湖为海外东南诸国赴京必经之地，为“天下要冲也，故有馆驿”。东南各国客使必先在芜湖驿暂住后，才“易以官舟”北上。江苏的苏州，也是东南一大交通城市。明代姑苏驿站很为讲究，建有亭、馆、楼、台等，其大门石柱中有20个大字的楹联：“客到烹茶旅客权当东道，悬灯得月邮亭远映胥江”。这副对联反映了我国明代驿站的服务情景。

明朝的北方驿路沿线，也建有不少华丽馆舍，有一些规格很高，很讲艺术，简直是一处高级的园林景区。河北省永年县明时称为广平府，万历年间当地知府为接待各地“驻节”之宾，在府城东建了一所“莲池胜地”馆舍，据记载，有正堂五间，耳房三间，还有水池一方，浮桥、画亭、台阁多处，名称雅致，称为“观莲坊”、“得月台”、“荷花馆”、“天开画”等等（《广平府志》）。但是，就普遍情况来讲，明朝尤其到中后期，北方驿馆大都是较简陋的。《宛署杂记》记载，当时北京西南的卢沟桥旁的宛平县境的驿铺馆舍，就残破不堪。因多年失

修，墙倒屋塌，铺兵都无处居住，只好在旁边租屋暂住。有邮书来到，招呼良久，才能发出。

水马驿和递运所，都是指各地的驿站和运输机构。水马驿同于宋元时期的“驿”和“站赤”。顾名思义，水马驿包括水驿和马驿两种，一用于河驿，一用于陆上文书的送递。明朝时一般 60 里或 80 里置一驿，每驿备有马 30 或 80 匹不等，小站则有少至 5 到 10 匹马的。水驿则备船。明朝基本和元朝一样，“常事入递，重事给驿”，即平常的文书交给步行的递铺，重要和紧急的文书才交给马驿办理。递运所是在一般的递和驿之外，明朝专门运送军需物资和上贡物品的运输机构。这种机构也分陆运和水运两种。始设于明初洪武年间（公元 1368—1398 年）。递运所的设置，是明代运输的一大进步，使货物运输有了专门的机构。递运所有专门负责的官员，设大使、副使各一人，另还设有百夫长。运输任务陆驿由军卒承担，水路则有各地船户负责。这种递运运输，基本上采取定点、定线，兼以接力的方法。这种专职的递运业务，把陆路运输和海、河运输很好地组织起来。可惜的是，明代递运所制度未能坚持，在弘治年间全国曾达到 324 处，而到万历年间便剧减至 100 多处，逐渐消亡了。明朝水运中还实行过一种“马快船”的制度。这是一种快速从水上运输贡物的船只。这种船，在河上运输时，“撑夫挽卒，昼夜喧呼。南北往来，道路如织”（《明经世文编》），十分热闹。

4 张居正的驿传改革

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有名的改革家。他对赋税、吏治等方面的改革，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历史有重大影响。在驿传方面，他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。

明朝自正德、嘉靖以后，政治日益腐败，邮驿制度也产生许多弊端。最高统治层利用邮驿，大肆挥霍。正德年间，发生了多起太监到各地驿站勒索驿银、捆打驿官的事件。司礼太监刘允借奉命去西藏迎接活佛之机，在沿途水驿大肆挥霍。在成都驿，日支驿粮百石，蔬菜银 100 两；在这里置备入藏物料，竟用银高达 13 万两。正德皇帝下江南游耍，所费更巨。他命令沿途驿站准备美女，以备皇帝来时随时寻欢作乐。这一次仅水路驿站所用人夫即达数十万，严重地骚扰了人民的生活，妨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。驿站承受不了这样沉重的负担，许多驿官都逃亡在外，驿务多废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明朝一些官吏主张对邮驿进行改革，先后主张改革驿务者有著名清官海瑞、吏部尚书吴鹏和张居正，其中以张居正的驿传改革成效最大。张居正改革，是我国邮驿史上的一件大事。

张居正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宰相，他的邮驿改革是从限制官员的驰驿特权入手的，提出了六条对官员的限制。比如，规定非公务任何官员不得侵扰邮驿；过往驿站的官员只许按国家规定的级别供应食宿，不许越格提出奢侈的要求；除邮驿供应外，任何官员不许擅派普通民户服役；还规定政府官员凡非公务而是到离任或请事假等旅途费用，一律不得由驿站负担，不得动用驿递的交通工具；等等。

这些改革，大大降低了邮驿的经费开支，也就减轻了人民的负担。据统计，经过整顿后，全国共省减邮驿经费 1/3 左右。

在改革中，张居正严格要求自己和自己的家人，从自己的身边做起。他的儿子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，不用官府邮驿，而是出钱自己雇车。张居正的父亲过生日，他也不动用驿车驿马，而是让仆人背着行李，自己骑毛驴回乡祝寿。张居正对那些违反条例的官员，绝不手软。有一个甘肃巡抚的儿子擅自驰驿，被他革去官荫。这一处分使得朝野上下很为震动，许多官员不敢再为非作歹了。张居正的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，“小民欢呼歌颂”。但是，明朝政府已经腐朽得不可救药，一两个张居正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他死后，生前的一些改革措施就被废除了，明代邮驿又重新陷入混乱状态中。

5 “民信局”的兴起

在明朝的邮驿事务中，有一件新兴事物是必需大书特书的，这就是“民信局”的兴起。所谓“民信”，当然是指民间自发经营的通信组织。

专家们认为，我国民间经营的通信组织是从明朝永乐年间兴起的。那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，不少大商人间需要一种业务上的联络，更重要的是货物的集散和资金的汇兑，都需要有一种联营的组织来承担。这便是“民信局”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。

对民信局从哪里兴起，学术界有两种看法。一种认为，这种联合经营机构最初是从四川兴起的。明朝永乐年间，四川居住着一批湖北麻城、孝感地区的移民。他们长年在外，思念故乡，于是自发组织了同乡协会。每年约集同乡，举行一次集会，在会上推选出代表，返回家乡探望一次。届时，移民们多托代表给家乡带去问好的信件，并托他捎带家乡特产回来。久而久之，建立了固定组织，俗称为“麻城约”。麻城约多以运带货物为主，同时捎带书信。这就是我国民办的第一个通信组织。另一种说法，则认为我国民信局最早是从浙江绍兴、宁波等沿海地区兴起的。明代官场多用绍兴人当幕僚，俗称“绍兴师爷”。他们分散在各省督抚巡按衙门中，联系广泛，成为帮派。互相之间经常有书信往来，函件相对较多。久而久之，便形成了初期的民信机构。宁波是绍兴出海的口岸，通信的枢纽，所以也就成为最初民营通信机构的据点。再则，宁波经商的人很多，他们也需要一个经常的信息交流和货物集散的机构，民信组织就应运而生。

以后这种组织在各地扩展开来，不限于湖北麻城在四川的移民，也不限于浙江绍兴、宁波。

清朝时候，上海、宁波等地开始把这种组织称为“民信局”，递转民间的信件，成为业务的一项重要内容。清朝中叶以后，民信局大大发展，达到最盛期。不仅遍及国内各大商埠，还把业务扩大到东南亚、澳大利亚、檀香山等华侨聚居

地带。在东南亚一带，民信局又称“侨批局”，仅新加坡一地，清朝末年时侨批局就达 49 家之多。有些侨批局，甚至一直活动到本世纪 40 年代。

6 清代“邮”、“驿”的合并

1644 年，李自成起义军推翻了明朝的统治。同年，清兵入关，建立了清王朝。清代邮驿制度经历了重要改革，其最大的特点是“邮”和“驿”的合并。

在清朝以前，虽说在某些文书上常常“邮驿”合称，但实际上邮和驿是两种职能不相同的组织机构。从汉唐以来，一直是：“邮”负责传递公文，是一种通信组织，也称为“递”，或称为“传”；而“驿”，实际上是只负责提供各种交通和通信工具，而兼有招待所的性质。二者互为补充，但毕竟是两套组织系统。清朝时候，这两种组织融为一体了。驿站从间接地为通信使者服务，而变成直接办理通信事务的机构。这样，实质上通信系统比先前简化了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。

清朝驿务的管理，归于中央兵部，专设一车驾司，任命官员七人，主管全国驿道驿站。同时又在皇宫东华门附近设两个专门机构，由满汉两大臣会同管理京师和各地驿务联系，下有马馆，专管驿夫驿马，又设捷报处，收发来往公文和军事情报。

据记载，清朝通信的时限达到了历史上最快的速度。以前，一昼夜最多跑 400 里、500 里，清朝的马递传送公文，最快可达一昼夜 600 至 800 里。康熙年间平定吴三桂三藩叛乱，从大西南到京师送军事情报，路程达 5000 余里，快马通信只需九天即可到。与此同时，康熙派施琅收复台湾，从福建报捷到京师，路程 4800 多里，也是九天内消息便可递到。

清朝驿站比明朝更为普遍，尤其在一些边远的县级地区，新设了“县递”。这种邮递在县间通信，弥补了干线驿站的不足。县递不是正规的驿站，但备有号为“递马”的通信马匹，起着驿站的作用，因为有县递的补充，清朝全国邮驿事业比前大大方便了。到光绪时，仅山东一个省，就有包括县递在内的正规和非正规的大小驿站 139 处。

雍正朝建立了军机处以后，清朝邮驿事业更有新的发展。军机处可以直接向下发放皇帝的上谕或诏令。有时候，这些上谕可以不经外廷内阁处理，由军机处直接交给兵部的捷报处发给驿站向下驰递。这些重要文书上面常常书有“马上飞递”的字样，表明其为急递文书。有的要求时限更紧，直接写上“六百里加紧”，甚至有要求“飞折八百里驿递”者，即要求以每日 600 里、800 里的速度抵达。这样的方式，既能保密又可以高效，说明邮驿又向前发展了一步。

清朝前期的皇帝，一般都是励精图治的。他们密切注意着边疆战事的发展，也十分关心邮驿的效能。有的时候，皇帝经常为了等驿报而通宵不眠。清代史学

家赵翼在《平定准噶尔附论》中，曾叙述到乾隆勤政的情景。说他每夜都要等前方的军报，不管什么时候来，都命周围的人立刻叫醒他。当通知的有关大臣奉旨来到时，他早已看完了公文，准备拟诏指示了。有时为了拟写一份递往前方的公文诏令，前后工作达几个小时。若前方有一两天不来军报，乾隆就坐立不安，夜不成寐。从北京到准噶尔前线，不啻万里之遥，来往文书需要一月有余，乾隆常常要预见到数月以后的形势，作出决定。

可以肯定，假若那时没有发达的邮驿设施，清朝皇帝们若要及时了解前方军情，进行适时的决断，对前方战局实行有效的遥控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7 清朝边疆邮驿的开辟

清朝时候，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。清政府在东北、北部、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，开辟了许多新的驿道，新设了若干邮驿机构。这些机构，随地区而名称不同，大部分称“驿”，军用称“站”，新疆、甘肃地区称为“塘”，北方蒙古地区称为“台”，甘肃一部分地区又称为“所”等。清朝统治者根据边疆各地的不同情况，继承以往各代边驿的优点，在全国建成稠密的通信邮驿网。清朝人钟奇说：“我朝边围驿站之政，到高宗而集其大成。”高宗就是乾隆。意思是乾隆时我国邮驿事业达到了古代的高峰。

那时候，东北地区邮驿发展最快。此地是清朝统治民族满族的发源地，又是对付沙俄侵略的前哨。清朝历代帝王特别重视当地的邮驿建设。康熙帝曾说：“此乃创立驿站之地，关系重要。”他在位时，在黑龙江省共设驿站 20 个，雍正时又增设 10 站。黑龙江通往北京的直达驿道共有五条，各从齐齐哈尔、瑗琿、珠克特依草地为起点，都长达 3000 里左右。从齐齐哈尔直通京师的驿道，俗称“大站路”，又称“御道”，是专门用作为皇帝进贡的道路，也是官府奉公驰驿专用的道路。雅克萨之战后，清军在黑龙江留下一条用作运输军需的大驿道，到光绪年间，重新开辟成去漠河采办金矿的大路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黄金之路”。清朝官吏李金镛顺着这条古驿道，亲自勘察路基。冒着寒风大雪，穿山越岭，跨沟攀崖，终于开拓了这条驿道，开发了漠河金矿。清朝康熙时这条路上原有驿站 25 个，李金镛时又增设 33 个，后来达到 36 处。至今这些站的地名尚在当地遗存。人们可以看到当初的驿道遗迹和这条“黄金之路”上的古驿遗址。

沈阳是清朝的故都，后称盛京。盛京将军属下所设驿道，以盛京为中心，西至山海关共有驿站 13 个，东至兴京（在今辽宁新宾西）有四站，南至朝鲜有七站，东北至宁古塔有三站。总计全境驿站 29 处。吉林将军属下也有驿站若干。这样，东北地区形成一个相当广大的交通网。

因为情况特殊，清朝时东北邮驿归属是和其他地区不同的。各省驿站归厅、州、县管理，而盛京地区则由驿丞统管，下设正、副监督二员，统于盛京兵部。

青海地区在清朝统治时期，邮驿也有很大发展。到乾隆时，已建成五条主要驿道，全青海共有驿站 24 个，递运所三个，驿夫所夫共 480 余名，驿马 592 匹。

清初，为了平定准噶尔叛乱，康熙也加紧在蒙古地区建立驿道和驿站。在那里先后建置了 47 个驿站，分布在喜峰口、张家口、古北口、杀虎口外。康熙对此有专门的指示：“今设立驿站，虽费用国帑，日后于蒙古裨益良多，亦不致迟延误事，最为紧要。”在漠北蒙古地区，清政府又分设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两个地区专理机构。乌里雅苏台设将军，驿务一律由军台管理。科布多设参赞大臣，邮驿也归军台管理。科布多共有 20 个驿台，乌里雅苏台共设 43 个驿台。在沟通中央和蒙古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，这些驿站驿台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康熙、乾隆两朝在新疆地区也设立了邮驿机构。开始，为了平定准噶尔战争中的军粮运输，康熙在从嘉峪关到哈密沿线设立了 12 个驿台，以后陆续向西不断推进。到乾隆时，共有驿台 125 处。此外尚有一部分邮驿机构称为“营塘”。从巴里坤到乌鲁木齐，乌鲁木齐到阿克苏，阿克苏到乌什，从叶尔羌到和田，从精河至哈密，总计驿台和营塘达到 285 个，由总管新疆的伊犁将军总稽查。

清朝在西藏的邮驿机构称做“塘”，全藏共有近 70 个。塘马共为 300 多匹。

清朝在西南边疆地区，大力发展邮驿事业。到乾隆时，贵州境内驿站达到 23 个，主要为递送政府公文及运输军粮。此后驿道不断改进，客观上也便利了商旅的交往。雍正时还在贵州开辟了许多山区驿道，如从黄丝驿至杨老驿，原来道路崎岖，十分难行，后来改道而行，既道途“坦易”，又“无岚障之虞”，大大方便了行人（《小方壶輿地丛钞》）。这样，清朝凭借这一邮驿系统，可以及时得到各地的信息，对各边疆地区进行着有效的控制。

8 旧式邮驿的衰败

清朝中叶以后，封建社会进入了总崩溃期。随着封建制度发展的旧式邮驿，自然也出现了许多无法弥补的弊端。尤其是生活在封建驿政下的劳苦大众，在水深火热中受到煎熬。康熙时有一位诗人，描写当时驿夫的悲惨生活说：“奔波面目黑，负背形神枯，水深泥没踝，衣破肩无肤，苦情不敢说，欲语先呜呜”（秦松龄《点夫行》）。如果是被迫抓来当水驿挽船的纤夫，则处境更为悲惨。有一位诗人梁清标写的《挽船行》的诗描写说：“穷民袒臂身无粮，挽船数日犹空肠。霜飈烈日任吹炙，皮穿骨折委道旁。前船夫多死，后船夫又续。眼见骨肉离，安能辞楚毒？呼天不敢祈生还，但愿将身葬鱼腹！可怜河畔风凄凄，中夜磷飞新鬼哭。”

如此恶劣条件下服役的驿夫，自然不可能有劳动的积极性，服役人员纷纷逃走。河北武清县东北，有一个河西驿，地处京东水路通衢，一直是各朝漕运的咽喉。清初时候，这里的邮务很发达，有役夫 152 名，驿马 33 匹。但到清晚期的光绪年间，这里驿务萧条，只剩下役夫 30 名，驿马 24 匹。当时有一位兼管驿务

的下层官吏，曾写了一部《河西驿日记》。在他的笔下，河西驿成为一个残破不堪的机构：破烂的房屋，即将倒塌的马棚，老弱待毙的病马，饥寒交迫的驿夫，构成一幅凄凉的图画，在河西驿上，还有不法的官吏，不断进行勒索，造成文报迟延，通信阻塞，邮务不能正常进行。这样的驿站，当然不能担负起邮驿通信的重责，而成为社会的赘疣，没有必要再存在下去了。

所以，有识的革新之士，早就提出取消这种过时的传统驿站，晚清著名思想家冯桂芬，专门写了一篇《裁驿站议》。他深刻揭露了清政府邮驿的流弊，指出有一名道员以往来贺节贺寿为名，竟用了 500 里排单，大大浪费人力物力。冯桂芬大声疾呼：“国家以有限之帑项，既饱县官私囊，复递无足轻重之例信，亦何贵此驿站为乎？”他认为应当下决心取消驿站，改设近代邮政。既利于官，又便于民。不仅可以省去国家每年 300 万元的开支，而且可借邮政收入数百万之盈余。一时，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、薛福成、郑观应等纷纷撰文，论述旧式邮驿之不便、新式交通通信设备之必须。在形势的逼迫下，清政府于 1896 年始办新式邮政，驿站逐渐被代替。到辛亥革命后的 1913 年，北洋政府终于宣布将驿站全部撤销。古老的中国，在邮驿制度上，经历了一次实质性的大变革。新式的邮政时代开始了。